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解读玄奘

王赵民 著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 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解读玄奘

王赵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玄奘/王赵民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4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宁法师、清修法师主编)

ISBN 978 - 7 - 80254 - 825 - 1

I. ①解… II. ①王… III. ①玄奘(602 ~ 664) - 人物研究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9443 号

解读玄奘

王赵民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杨登保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5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825 - 1

定 价： 48.00 元

解讀玄奘

丁力



总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

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究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

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的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

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中去,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的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

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玄奘精神照耀着千秋万代 (代序)

黄心川^①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思想家、翻译家、旅行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毕生追求的事业和奉献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为我国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地的民众所珍视,显现出万丈的光芒,他的精神正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玄奘是一个什么样的伟人?玄奘精神究竟是什么?佛教徒常常是从他的智证上去赞美他,如印度大乘佛教徒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佛教徒尊称他为“解脱天”。有人是从他的佛教学术成果来赞美他,如说“千部论主”或“三藏法师”等。印度的僧人和学者不仅赞美他的修持,而且也赞美他对印度佛教和历史所作的贡献,如印度孟加拉僧伽大会秘书长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

^① 黄心川,当代著名哲学家、佛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玄奘研究中心主任,印度龙树大学荣誉教授。

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称赞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一人”。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对玄奘的评论莫过于他的同时代弟子道宣律师所作的概括：“听言观行，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深，辩开疑议。实季代之英贤，乃佛宗之法将矣。”寥寥数语已将玄奘的高尚人格、学业成就和务实精神跃然纸上。我认为玄奘的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下面六个方面：

(一)真诚向外国学习、勇于开拓的精神。在玄奘活动的年代，印度的佛教、文化科技知识已大量涌入中国，玄奘是把它们作为先进的知识加以热忱地学习的。玄奘早年曾辗转各地，参访各种不同学派的名师，向他们请益受教。从他学习的经典情况看，无疑他已掌握了当时佛教义理、语言文化各个方面知识，但他从不满足于他所得的成就，常常对“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的问题进行寻根问底，渴望了解佛教的全面正确的知识。因此，当他从印度来华学者波颇密多罗那里知道了戒贤法师讲《瑜伽师地论》的消息后，便“杖策孤征，乘危远迈”，去印度寻求新的知识、开辟佛学研究的新途径。他到达印度后不辞艰难地几乎访问了当时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学者和婆罗门教有识之士，虚心向他们请教，即使是佛教的论敌或者外道，也如实地把他们的论点介绍给中国知识界。另

外,他在学习和研究瑜伽行派的过程中,糅合了印度当时流传的唯识十家之说,借以贯通新旧唯识的鸿沟,独辟蹊径,奠定了唯识新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建立了中国的法相宗。我觉得玄奘这种虚心向外国学习、富于创造的精神,对于我国当前西部的精神文化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

(二)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玄奘在去印度的路途中历尽了人类所能遇到的种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他跋涉过世界上最荒凉的塔克拉玛干炎热沙漠(塔里木),在流沙八百里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磷火飘忽,烂若繁星,但他孑然一身,望着聚骨马粪前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白雪坚冰的喀喇昆仑山脉(凌山)和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在印度境内还遇到了难近母(嗜血女神)教派的掠劫。此外他还克服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三难”——即学梵文难、得经本难和文化交流难。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玄奘是无法克服这些难关的。

(三)不慕荣利、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玄奘西行后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在印度学术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成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四大名师之一。戒日王优渥礼待,给予丰厚的供养,但他一直未忘出国的素志——“弘法利民”。当鸠摩罗王——戒日王上号“大乘天”和“解脱天”并坚留他在印度时,他答称:“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在他回国后,唐太宗

曾两次希望他能“还俗从政，辅佐朝廷”，但他矢志译经事业，婉言加以拒绝。玄奘这种精神正如汤用彤先生评说：“襟抱平恕，器量虚融……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衡……玄奘人格极高，为人所敬顺。”

(四)虔虔不懈寻求真理、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玄奘毕生翻译了印度佛教经律论 75 部 1335 卷，约 1300 余万字，占唐代译经的一半以上。另外，写下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他在佛教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将印度的佛教知识介绍给中国，并在中国发展了唯识学的理论和因明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与此同时还把中国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印度，翻译《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为梵本。就当时的学术情况看，他确是攀登了学术高峰，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待学术研究毫不含糊的科学态度。

(五)融汇教内外各派的宽容认同精神。这种精神集中表现在他的译经和与外道交流之中。众所周知，玄奘是一个大乘瑜伽行派学者，但他选择翻译的经论中，大小乘并举，对佛教各主要学派的基本经典如《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五个足论，都没有从他所持的立场加以排斥。玄奘并不专门弘传中观理论，但他翻译了中观派般若学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广百论》等等。大乘中观派的清辩论师是瑜伽行派护法论师的论敌，但他将清辨的《掌珍论》译出了。另外，他对教外的一些经典，如婆罗门教正

统派哲学——胜论的根本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也如实地译出了。我国道教的根本经典——《道德经》，玄奘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它译成了梵文。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在翻译《道德经》时，道士蔡晃、成英等出于宗派的偏见，力图将《道德经》的思想融会佛教的《中论》、《百论》的思想，但遭到了玄奘的拒绝，玄奘说：“佛道两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义？”又说：“观老治身治国之文，文词具矣。”他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辩论大会上取得胜利后，马上取消和宽恕了外道顺世论者在辩论前所作的卖身等种种誓言。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统治的时期，正是儒释道三教斗争和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等沙门思潮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玄奘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不偏不倚、宽容认同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工作作风踏实、计时分业的精神。玄奘一生始终把他的精神全力贯注到工作中去。《慈恩传》对他回国后每天译经的情况有所描述。他每天对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都有详细的安排，做到“计时分业”。如果白天不能完成，晚上也要补足。由于他的勤奋，使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奘传资料统计，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龙朔三年(663)十月，在17年6个月中共译出佛经1335卷，每年平均为75卷，每月约6.25卷，即5日1卷。玄奘晚年驻锡玉华寺时(659—664)，5年中共完成14部682卷，平均每年完成136卷，每月完成10卷，较过去增加了将近一倍。玄奘所译的最重要经典如《大般若经》、《成唯

识论》、《唯识二十论》都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玄奘这种精厉晨昏、专思法务、虔虔不懈、死而后已的精神真使我们感动。

玄奘一生大半是在祖国西部度过的，他对祖国人民和土地有着无限眷恋，即使身处异国时，也“本土思渴，不敢留须臾”。在当前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也要学习和发扬玄奘的精神，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绪 论

佛教由公元前 6 – 前 5 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姓乔达摩(S. Gautama, P. Gotama),名为悉达多(S. Siddhārtha, P. Siddhattha)。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 29 岁(一说 19 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位,出家修行。35 岁时,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开启佛教,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 49 年。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尊称为佛陀,意思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佛是佛陀的简称,佛教即佛陀的教育。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现在公认的说法是:“明帝永平十年(67)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次日早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皇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 18 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人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和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皇帝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为白马寺。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

大凡信奉佛陀教义，离开世俗生活，修行佛法的出家人被称为僧人、和尚。“和尚”原来是从梵文这个字出来的，它的意思就是“师”。和尚本是一个尊称，要有一定资格堪为人师的才能够称和尚，不是任何人都能称的。这个称呼并不限于男子，出家女众有资格的也可以称和尚。但是后来习俗上这个字被用为对一般出家人的称呼，而且一般当做是男众专用的名词，这是和原来的字义不合的。现在一般对出家人的尊称为法师，德行高深、受人尊敬的法师称为高僧。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很多彪炳史册的著名高僧。如果要问，我国古往今来最著名的和尚是谁？恐怕众人都会脱口而出：唐僧！是不是确有其人，暂且不管。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出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僧的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唐僧出生后也差点遭灭口，母亲只好偷偷把他放入木盆顺江漂走，听天由命，所以唐僧最初的名字叫江流儿。江流儿在漂过金山寺时被法明和尚所救，在寺院里长大，成人后取法号叫玄奘，从此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可见，《西游记》里的唐僧的出生颇有传奇色彩。但如果再要问，《西游记》里的唐僧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原型？如果有，原型是谁？唐僧真有其人吗？

我们说，唐僧确有其人，他的名字叫玄奘，俗名陈祎，今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是他的故乡。他孤身西行取经，被后世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壮举。回国后，他建立译场，翻译佛经1335卷，开创了我国佛教发展的新纪元，影响广泛，超越了时空、国度。

玄奘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人类文明的面貌和进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慢慢地变成了传奇，传奇慢慢地变成了神话，真实的玄奘越来